

明清江南市鎮志的園第書寫與文化建構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

江南市鎮在文化方面是否有它們的地位呢？在思考市鎮的文化面向時，園林第宅可以說是探索此議題很好的出發點。關於明清江南市鎮史的研究，過去學者主要是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為人所熟悉的明清江南園林與第宅，大多是位在蘇、杭等大城市中，研究成果也都是集中在城市的園林。但除了城市以外，在市鎮中也有許多園第，是過去學者所忽略的。

本文擬從三個方面來探討江南市鎮的園第文化：首先，觀察明清江南市鎮園第興建的客觀現象，諸如園第的興建與晚明以來社會風氣的關聯性，明清江南市鎮園第數量的興衰所反映的社會與經濟變遷，以及市鎮所具有營建園第的優越條件等問題。

其次，透過對市鎮志中〈園第志〉的文本分析，嘗試解釋該文本背後的動機與選材標準。撰述〈園第志〉背後的目的，是為塑造地域文化的優越。此外，〈園第志〉經過選擇後只記載合乎「文人化」的園第，而非士大夫身份者所建的園第被有意地排除或忽略。

最後，從〈園第志〉書寫所強調的兩個面向，即園第內的文藝活動與物質文化，藉以說明士大夫建構他們特殊園第文化的模式。園第內的文藝活動不但是一種文化名聲的建構，也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建構，藉此將園第及其主人的聲望與影響力量擴大。而園林第宅內的物質文化，具有豐富而多元的象徵意義，各種物品象徵著園第主人的財富、文化品味與身份地位。這兩種形式互相作用、交互影響，建構了「文人化」園第的形象。

於是市鎮志在塑造地方文化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是將文人文化再複製，強化了傳統士大夫的文人文化。

關鍵詞：明清、江南、市鎮、園林、第宅

前言

關於明清江南市鎮史的研究，過去學者主要是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關注它們在市場體系、「資本主義萌芽」，或是在「早期工業化」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¹近年來又有學者從「地域社會」與權力關係的角度，來觀察江南市鎮的社會史與政治史；或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重新觀察市鎮的興衰。²然而，江南市鎮在文化方面是否有它們的地位呢？在思考市鎮的文化面向時，園林第宅可以說是探索此議題很好的出發點。

園林是以種植花木、建亭台高樓，以供遊賞的住宅；而第宅或宅第指的是貴顯者的住宅，多少也有些花木亭樓之勝。在當時士大夫的眼中，兩者是否有差異呢？就像明代湖州人陳函輝在〈遊靈水園記〉一文中所云：「湖中諸大家，類治居第，而寡園林之趣，鮮有可觀者。」³園林因為經過精心的設計，對士大夫更具有文化象徵的意義，所以較第宅更有趣，更值得觀。雖然如此，但在研究時若以地域性的社會文化史角度切入，而不強調美學與建築時，兩者仍是可一併探討的。在文獻上兩者也常被並置而不作區分，例如在江南的市鎮志中多列有〈園林〉與〈第宅〉，但也常合稱〈園第〉志。

過去熟悉的明清江南園林與第宅，大多是位在蘇、杭等大城市中，而研究成果主要是集中在城市的園林。早期關於中國園林的著作，大多是屬通論性的介紹，而且焦點放在園第內建築與園藝的美學，以說明傳統中國人重視自然的觀點。近年來學界有以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明清城市園林，將園林詮釋為明清士大夫著意隱居以及建構生活品味的空間。另外，更引人注目的是強調園林所具有的社會功能與政治作用，包含了人際網絡與社會聲望的建構等等。⁴

* 本稿草成之初，承本所王正華教授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特別在此致謝。

¹ 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相當豐富，以下僅列與正文所提及主題相關的專書，如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樊樹志，《江南市鎮：傳統的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² 趙世瑜、孫冰，〈市鎮權力關係與江南社會變遷——以近世浙江湖州雙林鎮為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2期，頁124-152；孫冰，〈鎮志的編纂和明清江南市鎮變遷——以浙江湖州雙林鎮為例〉，《中國地方志》，2005年4期，頁55-61；范毅軍，《傳統市鎮與區域發展：明清太湖以東地區為例，1551-1861》，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5。

³ 民國 盧學溥，民國《烏青鎮志》，卷17〈園第〉，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據民國二十五年刻藍印本影印，1992，冊23，頁11a。

⁴ Joanna F. Handlin Smith, "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 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1, No. 1 (Feb., 1992), pp. 55-81; 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明清江南的市鎮中也有大量的園第，然而相關的研究卻不多。⁵本文擬從三個方面來探討江南市鎮的園第文化：首先，觀察明清江南市鎮園第興建的客觀現象，諸如園第的興建與晚明以來社會風氣的關聯性，明清江南市鎮園第數量的興衰所反映的社會與經濟變遷，以及市鎮所具有營建園第的優越條件等問題。其次，透過對市鎮志中〈園第志〉的文本分析，嘗試解釋該文本背後的動機與選材標準。最後，從〈園第志〉書寫所強調的兩個面向，即園第內的文藝活動與物質文化，藉以說明士大夫建構他們特殊園第文化的模式。本文希望透過這些討論，為江南市鎮的園林定位，又可以對過去園林的研究作出一點補充。此外，透過對〈園第志〉的探討，讓我們重新思考市鎮志的性質，以及其所呈現的地域文化和菁英文化的關係。

第一節 明清建築園第的風氣

明初至中葉仍屬於經濟恢復時期，江南雖是全國的經濟重心，不過當時無論是官宦士大夫或富人，一般在消費方面是頗為簡樸的。明中葉以前，住宅居室的建築無論在裝飾與空間方面都是很樸素，不致於過度華麗，即使是富人家也都是「多謹禮法，居室不敢淫」，所以「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⁶甚至是仕宦家，也是「所居室閭，同於白屋。」⁷明初雖也有富人建園第，惟規模雖宏，卻不奢華。最著名的例子是蘇州府周莊鎮關於沈萬三家宅的「傳說」，據明人楊循吉(1458-1546)《蘇談》載：「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不甚宏大，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⁸陶煦(1821-1891)所撰的光緒《周莊鎮志》記載沈萬三家宅時亦云：「倉庫園亭住宅互相聯絡，其巨富氣象猶可想見，然亦僅中人家制耳」；「可知萬三里居，並無奢侈之蹟，故明太祖雖忌之，而無可加誅也。」⁹其實，沈萬三在元朝時早已過世，沈氏在明初洪武年間又分為四家，但是人們提到江南首富沈家時，仍是習慣用沈萬三來概括之。故而，上述的記載應該反映的是明初沈萬三家族的情況。¹⁰

為何在明前期富人不敢建奢華的園第呢？除了因為消費力有限之外，從文獻來看還有可能是與賦役制度有關。據乾隆《震澤縣志》描寫明代的情形：「邑在明初，風俗誠樸，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飾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為居，裙布荆釵而已；即中產

⁵ 雖然江南市鎮的研究多少都曾提及園第，但專論市鎮園第的研究則非常少，較高價值的僅見孫冰，〈園林：財富、文化和權力的變遷——以浙江湖州雙林鎮為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5年2期，頁34-39。他以明清時期的雙林鎮為例，探討園林作為一種文化資源，故而移民憑其財力投資園林，使財富與文化結合，並融入當地。但至道光以後，善堂間取代園林之功能，遂使園林衰落。

⁶ 明 顧起元，《客座贅語》，卷5〈化俗未易〉，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70。

⁷ 清 劉光業等撰，康熙《淮安府志》，卷1〈風俗〉，康熙24年刊本，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頁3b。

⁸ 明 楊循吉，《蘇談》，〈萬三遺宅〉，收在《蘇州文獻叢鈔初編》，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頁170。

⁹ 清 陶煦纂，光緒《周莊鎮志》，卷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光緒八年元和陶氏儀一堂刻本影印，1997，冊717，頁23a。

¹⁰ 又據學者考證，沈家一敗塗地，是從洪武二十六年「藍玉案」開始的。參見顧誠，〈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蹟考〉，《歷史研究》，1991年1期，頁65-84。

之家，前房必土墻茅蓋，後房始用磚瓦，恐官府見之以爲殷富也。」¹¹可見當時即使是中產之家稍有資財者，都深怕被官府發現後，會被檢選爲糧長役之類的苦差事，所以並不敢過於聲張。¹²在市鎮志中的確有例子顯示有因徭役破家，而其所建園第亦毀的家族。如上海縣紀王、諸翟兩鎮之合志——康熙《淞南志》中，記有秦氏故宅，「秦氏自宋居此……歷元至明。萬曆中有秦可成者，以徭役破，家宅遂燬。」朱氏故宅，「即明初稅戶，號西軒者所居，人稱朱糧長家。後漸式微，宅歸秦氏。」¹³

到明中葉以後則出現變化，江南的住宅逐漸走向奢華。如常州府江陰縣，「國初時，民居尚儉樸，三間五架制，甚狹小。……成化以後，富者之居，僭侔公室。」¹⁴《名山藏》記嘉靖年間的變化：「當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窖圈四圍十室而已。今重堂窈寢，迴廊層臺，園亭池館，金翠碧相，不可名狀矣。」¹⁵嘉靖中葉以後的江南城市，逐漸吹起一股建築豪宅與園林的風氣。¹⁶在這波風氣中江南的縉紳士大夫是帶動者，人云：「縉紳喜治第宅，亦是一蔽。……及其官罷年衰，囊橐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¹⁷一般縉紳士大夫在宅第營治的花費，少者約數十兩白銀，多者至數百兩。最奢華的莫過於營建園林了，一園之設，少則白銀千兩，多則至有萬金之譽。這種風氣也吹到富貴人家，所以在方志中有記載稱：「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綴獸頭，循分者嘆其不能頓革」；「富家堂寢外間有樓閣別館」；江南富翁，「輒大爲營建，五間七間，九架十架，猶爲常耳。」¹⁸若不是裝飾華麗，就是擴大營建空間。顧起元(1565-1628)說的更明白：

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囿僭擬公侯。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¹⁹

¹¹ 清 陳和志修，倪師孟等纂，乾隆《震澤縣志》，卷25〈風俗序〉，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11年修光緒19年重刊本影印，1970，號20，頁2a。

¹² 另一種說法也是與稅收制度有關，據《丹午筆記》云：「明紀民間有大廳者，即加門檻稅，故今人稱有門檻之家。元時民屋高大者亦徵稅，故民舍低小，不敢起樓。」富人之家大概也是怕被政府加重課稅，所以不敢起高樓園第，但此說尚無例可驗證。

¹³ 清 秦立編，康熙《淞南志》，卷3〈園宅〉，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嘉慶十年秦鑑刻本標點出版，2006，冊13，頁37。同時又記秦氏宗祠，因秦可成以徭役破家，「舉室遷避，泣謝神主悉抱而投諸火，而數百年之遺蹟泯矣。」

¹⁴ 明 趙錦修，張袞纂，嘉靖《江陰縣志》，卷4〈風俗記〉，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據嘉靖26年刻本重印，1963，冊13，頁2b。

¹⁵ 明 何喬遠，《名山藏》，卷102〈貨殖記〉，臺北市：成文出版社據明崇禎十三年刊本影印，1971，頁11b。

¹⁶ 清 曹家駒，《說夢》，卷2〈紀松江園亭之興衰〉，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74，4編8冊，頁15b。

¹⁷ 明 謝肇淛，《五雜俎》，卷3〈地部一〉，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頁75。

¹⁸ 清 陳和志修，倪師孟等纂，乾隆《震澤縣志》，卷25〈風俗序〉，頁2a；明 董邦政修，黃紹文纂，嘉靖《六合縣志》，卷2〈風俗〉，收在《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嘉靖刊本影印，1990，冊7，頁4a；明 唐錦，《龍江夢餘錄》，卷4，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弘治17年郭經刻本影印，1997，子部，雜家類，冊1122，頁13a。

¹⁹ 明 顧起元，《客座贅語》，卷5〈化俗未易〉，頁170。

由此可見就連老百姓也受此風所染，雖沒有擴建住宅空間，但內部如客廳的裝飾也是用昂貴的花費所打造，甚至妓院「勾欄」也是雕樑畫棟。

晚明之所以興起營建園林第宅之風，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觀察。一是晚明消費力的提升，也就是「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y)的形成。²⁰另一方面是明初制約這種奢侈消費的賦役制度出現變化，因為士紳可以優免徭役，或透過其它手段逃避糧長役，於是大大方方地蓋起園第，不用再顧慮被僉選為糧長役。至於有錢的富豪巨賈，也可以透過捐納買得功名地位，一樣可以享受士紳的待遇。這也是為什麼晚明營建園第之風，逐漸普及與盛行的原因。

晚明以來興築的園第，明顯地是集中在城市裡，就像清人陳祖范(1676-1754)曾提到蘇州府常熟縣某孫氏第宅時所云：「邑中舊族位望通顯者不少，惟孫氏之先，兼有文翰風流林泉高曠之致。他家第宅多列通衢，孫氏獨擇虞出勝處，……(邑中)列通衢，稱甲第者，幾易其主。」²¹明清以來也有不少關於在城市築園第，而與鄰人發生爭執或糾紛的故事，如《花當閣叢談》中有一則描寫弘治朝曾任吏部尚書的屠滹辭官後，回鄉營建第宅，「規畫已定，宅前有老嫗敗屋兩楹，適當門址，屢使人從容譬說，欲券之，嫗堅不從。」²²據該書作者徐復祚(1560-1630?)所云，這種現象在江南很普遍，當時高官營建第宅時常會出現這類情況，「即主人不言，門幹狠僕，亦必多方遣逐之矣。聞江陵相公在位，欲買鄰居益宅，其人死守不肯去，有荊州府同知某者，私為款曲，其人倍直，與之歸券，江陵同知遂得陞荊州知府。」²³清人姚廷遴(1628-1697)《歷年記》也描寫清初松江有府城鄉紳黃機右，「當此盛時，竟不做好事。住宅周圍，遍買居民房屋，拆去改花園，不論人家願與不願，蓋以勢壓之，故使人甚有恨者。」²⁴官紳在營建第宅時，甚至動用鄉人充當徭役，如《花當閣叢談》談到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甃亦責供焉。」²⁵

這種現象一方面是縉紳為了顯示自己的成就，但是相習成風之後，更成為彼此爭勝的情況。如何良俊(1506-1576?)就形容：「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營治一園。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贏，尤以此相勝。大略三吳城中，園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²⁶清人葉夢珠在《閩世編》中也提到松江府的情形：「余幼見郡邑之盛，甲第入雲，明

²⁰ 從消費的角度來看明清的奢侈風氣，反映了消費社會的誕生。而消費社會所以在晚明誕生，導因於明中葉以後在經濟、社會與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變遷，和18世紀英國的情形頗為相似。有關晚明消費社會的興起，參見拙作，《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北：聯經，2007，第一章。

²¹ 清 陳祖范，《陳司業文集·詩集》，卷3〈畫映雪山居圖〉，乾隆29年刊本，史語所藏善本書，頁17b

²² 明 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3〈屠太宰〉，台北：廣文書局，1969，頁39a。

²³ 明 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3〈屠太宰〉，頁39b。

²⁴ 清 姚廷遴，《歷年記》，〈歷年記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1982，頁126。

²⁵ 明 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3〈錢尚書〉，頁37b。

²⁶ 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卷12〈西園雅會集序〉，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據明嘉靖44年何氏香嚴精舍刊本影印，1971，頁9a。

園錯綜，交衢比屋，闐闐列廬，求尺寸之曠地而不可得。縉紳之家，交知密戚，往往爭一椽一磚之界，破面質成，寧揮千金而不恤。」²⁷

第二節明清江南市鎮中的園第

明清江南除了城市以外，在市鎮中也有許多園第，例如《朱涇志》描寫金山縣朱涇鎮的情形，標榜該鎮建築自明以來與過去之不同處：「里中名蹟，由唐至元頗多梵宇。自有明以來，漸著名園、故第、邱墓矣。」²⁸清人杭世駿(1696-1773)在乾隆《唐棲志略稿》的〈序〉文中，也描寫杭州府仁和湖州府德清二縣之交的唐棲鎮，自明末以來的園林盛況：「呂、丁、吳諸大姓，矯尾厲角，崢嶸於勝國之季，聲妓園林，號稱極盛。」²⁹由此現象說明了晚明以來競築園第的奢靡風氣，已逐漸蔓延到城市之外的小市鎮。以下將略述江南市鎮中所興築園第的數量，並嘗試探討影響園第衰敗的外部因素。再者，為何選擇市鎮作為營建園第的地點？市鎮是否具有某些特殊優越的條件呢？這是接著要探究的問題。

江南市鎮中園林第宅的興衰

江南市鎮的園第自明中葉以後陸續都有人增築，從下表中的統計可知，在數量上雖無法與蘇、杭、湖等府城內的園第相比，但也不容小覷。雖然江南諸多市鎮興起與繁榮的時間，彼此或有不同，而市鎮內的園第又因各自內部因素，如家族聲望、科舉成就以及財富持續各有變化，所以園第興衰的時間不一定有一致性。不過，大體上而言約略可以看到大部份的園第是在明嘉靖年間以後所興築的。

	明清園林第宅的數量		資料來源
	明代	清代	
松江府青浦縣朱家角鎮		23	嘉慶《珠里小志》卷7〈第宅〉
松江府上海縣法華鎮		29	民國《法華鄉志》卷7〈園林·第宅〉
湖州府歸安縣雙林鎮		27	民國《雙林鎮志》〈圖說〉
杭州府仁和、湖州府德清二縣交之唐棲鎮		57	光緒《唐棲志》卷5〈志遺蹟〉
蘇州府吳江縣黎里鎮	8	31	嘉慶《黎里志》卷4〈古蹟·園亭〉； 光緒《黎里續志》卷3〈古蹟·園第附〉
蘇州府吳江縣同里鎮	24	10	嘉慶《同里志》卷5〈園第〉頁2a~3b

²⁷ 清 葉夢珠，《閩世編》，卷10〈居第一〉，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頁208。

²⁸ 清 朱棟纂，《朱涇志》，卷4〈名蹟志〉，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市：上海書店據嘉慶十二年本標點出版，1992，冊5，頁43。

²⁹ 清 何琪纂，乾隆《唐棲志略稿》，《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據清光緒間錢塘丁氏嘉惠堂刻武林掌故叢編第二集本影印，1992，冊18，頁1a。

蘇州府吳江縣盛澤鎮	5	9	光緒《盛湖志》卷5〈園宅〉頁6a-9b
湖州府烏程縣南潯鎮	25	160(第宅144、園林16處)	民國《南潯志》卷9-10〈宅第一、二〉、卷11〈園林〉
嘉興府秀水、桐鄉、嘉興三縣交之濮院鎮	14	37	民國《濮院志》卷12〈園第〉
浙江嘉興府桐鄉縣烏青鎮	16	14	民國《烏青鎮志》卷17〈園第〉

而園第的衰敗除了內部原因之外，外力影響園第走向毀滅，最重要的就是兵燹的因素。葉夢珠《閱世編》談到松江府內縉紳家的園林第宅，「一旦遭逢兵火，始而劫盡飛灰，繼之列營牧馬。昔年歌舞之地，皆化為荆榛瓦礫之場」。³⁰這些園第遺址半沒荒煙，而子孫已不知流落何方，如何不令人嗟唏呢！從明中葉以來，明清江南市鎮的園第經歷了幾次較大的浩劫，都是由於戰爭所造成的。嘉靖年間的倭亂，曾經使部份江南市鎮的園第遭受損壞，如蘇州府長洲縣的周莊鎮有明人戴暉，號南園，「嘗即其家開陂池園亭，與親朋共娛暇日，無何倭警寇發，竟遭一炬。」³¹其他的例子如蘇州府嘉定與昆山縣之交的安亭鎮，鎮內名第世美堂，「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³²可見當時的園第因倭亂受災者必不少。

但論受創的範圍與規模，倭亂的傷害遠不及明清之際的兵燹來得嚴重。許多的市鎮志都提到明季到清初順治乙酉年間（即順治二年，1645），園第遭到當地巨寇鄭九之兵所毀。如湖州府的晟舍鎮內有多處園第，如聚芳亭、逸老堂、書林樓、菊花圃、振藻堂、一草堂等，都是在明季皆遭巨寇鄭九所燬。³³上海縣的紀王、諸翟兩鎮，有為善最樂堂、太初堂、秦氏花園與太初園等，都是在明季廢或遭毀。³⁴湖州府歸安縣的雙林鎮，有明人沈楷所有的沈家園，至清代時，「國初楷宅被焚，園遂廢，今桑柘成陰，餘成廬舍矣。」另一名勝也足軒，為明人談純所創，有朱國楨的題額，但至「崇禎甲申秋燬，軒額尚存。」³⁵所以清初有不少文人留下的詩作，表現出對明季毀圮後之園第的感傷。³⁶

³⁰ 清 葉夢珠，《閱世編》，卷10〈居第一〉，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頁208。

³¹ 清 陶煦，光緒《周莊鎮志》，卷4〈人物〉，頁17a。

³² 清 孫岱、陳樹德編輯，嘉慶《安亭志》，卷13〈第宅〉，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清嘉慶十三年刻本標點出版，2004，冊2，頁207。

³³ 清 閔寶梁纂，同治《晟舍鎮志》，卷2〈古蹟〉，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市：上海書店，清同治間纂據浙江省圖書館藏抄本影印，1992，冊24，頁1a-2a、6b-7a、10a、11a。

³⁴ 清 秦立編，嘉慶《淞南志》，卷3〈園宅〉，頁38。

³⁵ 清 蔡蓉升原纂，民國 蔡蒙續纂，民國《雙林鎮志》，卷11〈古蹟·名勝·名勝題詠附〉，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市：上海書店據民國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影印，1992，冊22下，頁4b、6a。

³⁶ 如蘇州府嘉定縣的南翔鎮，鎮中的檀園乃明代著名的文人李流芳所闢，至明清之際已毀圮，嘉慶版的鎮志中就蒐錄了清初文人朱瀚與明遺民唐瑀所作的詩。參見〔清〕張承先著、程攸熙訂，嘉慶《南翔鎮志》，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卷11〈雜誌·第宅〉，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民國十三年鳳翥樓重印本標點出版，2004，冊3，頁183。

至十九世紀中葉，江南市鎮的園第又遭受另一次的浩劫，這次是因為清軍與太平軍的戰爭，波及到了江南地區，從江南市鎮志的史料，也反映出這次戰爭的影響。特別是在咸豐十年(1860)與同治三年(1864)，前者因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又東征蘇、常與上海等地，後者因湘軍陷蘇、常，又破太平天國之天京(南京)，江南市鎮的園第遭毀多集中在這兩年。如嘉興府濮院鎮內的西園與綠蔭山房，「咸豐庚申燬」。³⁷湖州府的南潯鎮內，有大宗伯第，係明朝禮部尚書董份(1510-1595)所居，「至咸豐時燬於兵燹，光緒中始易他姓。」還有憩園，「在西柵外方丈港東，嘉慶二十年朱餘亭所築，燬於粵匪，今改建他屋。」³⁸嘉興府烏青鎮的方志有一段對宜園的描述：「咸豐庚申，同治甲子，兩次遭難，合鎮俱遭兵燹，園宅毀廢殆盡，此園巋然獨存。」宜園雖然避過了咸豐十年與同治三年的兩次兵燹，但是該鎮其它的園宅則是毀壞殆盡，同鎮的寶敕樓、孔家花園與副憲徐汝嶧宅，都是在清咸豐庚申之難被燬。³⁹湖州府的晟舍鎮中，據鎮志記載，至少有且適園、書錦堂、抱宏堂、都闔第、雙桂軒與冷香榭等處，是在同治三年毀於兵燹。⁴⁰金山縣的張堰鎮內，據方志記載有舉人何宏統宅與行素堂二處，是在咸豐十一年時遭兵毀。⁴¹松江府的楓涇鎮有適園，園後之望雲樓於同治二年燬於兵，又有宜樓、真人婁近故垣故宅與四詠閣等處，鎮志云其「咸豐十年兵燬」。⁴²嘉定縣的錢門塘市有靜逸軒，「洪楊亂後，屋宇雖存，門窗盡毀。」⁴³蘇州府木瀆鎮著名的潛園、息園與端園，「庚申兵燹後，潛、息兩園俱廢，而端園獨存。」⁴⁴戰後的江南市鎮有部份迅速恢復舊觀，甚至還有新興的市鎮出現。⁴⁵而江南市鎮內的園第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也仍有新築者，但已不如十九世紀之前的盛況。

³⁷ 民國 夏辛銘，民國《濮院志》，卷12〈園第〉，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市：上海書店 據民國十六年刻本影印，1992，冊21，頁14b、16b。

³⁸ 民國 周慶雲，民國《南潯志》，卷11〈園林〉，頁1b-2a。

³⁹ 民國 盧學溥，民國《烏青鎮志》，卷17〈園第〉，頁15b-16a、20b。

⁴⁰ 清 閔寶築纂，同治《晟舍鎮志》，卷2〈古蹟〉，頁4a-16a。

⁴¹ 其它還有知足知不足齋、上舍姚前綬宅、世賢堂、縣丞錢培名宅、訓導姚亮采宅與四美堂等，方志只記「寇毀」，大概也是這段時期遭難。參見清 姚裕廉、范炳垣修輯，清《重輯張堰志》，卷3〈志名蹟·園林〉，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據民國9年松韻堂印本標點出版，2005，冊5，頁90、92-93。

⁴² 另外有旌孝義陳仁宅、鄉飲王任相宅、三友齋、方伯陳祁宅、壽官郁昌齡宅與鎮撫尤毅宅等多處，記載是遭「兵燹」。清 許光墉、葉世雄、費漢修輯，光緒《重輯楓涇小志》，卷3〈志名蹟·園林〉，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冊6，頁69-73。

⁴³ 民國 童世高編纂，民國《錢門塘鄉志》，卷4〈名蹟志·第宅園亭〉，童世高〈靜逸軒記〉，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63年上海市管會鉛印本標點出版，2004，冊2，頁55-56。

⁴⁴ 民國 張郁文纂，民國《木瀆小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卷1〈古蹟〉，上海市：上海書店 據民國十年蘇州華興書局鉛印本影印，1992，冊7，頁39。

⁴⁵ 江南東部海岸地區(松江、太倉境內)市鎮所受的破壞只是點狀的與少數的，而浙西杭、嘉、湖三府受害則較嚴重。江南沿海地區受影響的市鎮因為淪陷較晚且規復較早，受害期間較短暫，故戰後均能迅速恢復舊觀，甚至更加繁榮。此外，戰後不乏因太平軍的影響，而形成的新市鎮。有關太平天國運動對江南市鎮的影響，參見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頁89-97。

為何選擇在市鎮建園林第宅？

晚明以來江南競築園林第宅的風氣，大多集中在城市，那麼為何又有人會選擇建在市鎮中呢？當然，最明顯而易見的原因，就是城市地價偏高，而且居民密度高，住宅擁擠，想要購置相當的土地面積蓋起園林第宅並非易事，即使有足夠的金錢與權勢，也會發生像第一節所形容的許多糾紛，甚至引起民怨。於是退而求其次，將園第蓋在市鎮是另一種選擇。

然而，選擇在市鎮築園第還有其它的原因，除了經濟條件以外，市鎮會受到青睞還有其它的優點，特別是它們的地理條件所具有的優越性。袁枚(1716-1797)曾云：「凡園近城則囂，遠城則僻。離城五六里遙，善居園者，必于是矣。」⁴⁶青浦縣黃渡鎮內有清人陸復益所構建的吟嘯堂，有青浦縣名士諸嗣郢(1624-1682)爲之作〈記〉，其云：

邑之東北境為黃歇渡，濱吳淞江上，其地距城稍遠，向聚商賈為市鎮，土厚而俗淳，士人每樂居之。陸君君滋因卜宅焉，名其堂曰吟嘯。去江不數武地，雖近市，而湫隘囂塵之狀隔不相入。……登其堂，眺江中風帆，時相往還於竹樹之杪，九峰翠屏、古剎浮屠皆聳峙乎西南，於朝曦夕月之未上，隱隱煙霞環繞，雖輞川、平泉莊何以過之哉。……今君數椽榜江上，又得群峰遙遙相望，何必攜酒肴、鼓舟楫，始適其吟嘯之興，與彼有良田廣宅，足以息四體之役者，更無論矣。⁴⁷

從上文中透露出為何選擇園第蓋在市鎮，一因市鎮在距離上離城稍遠，可以避開城市的喧囂，但同時也具備市場的功能，在生活便利性上不輸城市，卻又不致於影響閑靜的生活。再者，許多市鎮在地理位置上，正好是處在觀賞附近美麗景勝的絕佳位置，於是在此築園第可以將附近山水一覽無遺，也正符合明清時期好「遊」風氣的需求。⁴⁸

再就距離而言，市鎮位處城鄉之間，正好是去縣城一天可以來回的距離，所以園林建在市鎮附近有其便利性，又有其功能性。就像光緒《唐棲志》形容的「水一方」：「距鎮三四里，深不在山，近不在市，園亭霍稱，於斯為最。」⁴⁹還有許多的例子，都將市鎮的園林第宅形容成近市塵中，又能不為塵市喧囂所染，可作避市塵囂之處。如乾隆《盛湖志》形容盛澤鎮內的沈氏園第：「一丸塵市內，乃有小瀟湘，勻水吞雲夢，孤峰秀辟

⁴⁶ 清 袁枚，《小倉山房（續）文集》，卷29〈榆莊記〉，收入王英志校點《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507。

⁴⁷ 清 章樹福纂輯，咸豐《黃渡鎮志》，卷9〈雜類上·園第〉，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據咸豐三年刻本標點出版，2004，冊3，頁148。

⁴⁸ 關於明清江南的旅遊風氣與旅遊文化，參見拙作，〈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收在熊月之與熊秉真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5月，頁225-255；〈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1，2003年9月，頁87-143；〈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0，2005年12月，頁235-285。

⁴⁹ 清 王同纂，光緒《唐棲志》，卷5〈志遺蹟〉，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據清光緒十六年刻本影印，1992，冊18，頁18a。

疆。」⁵⁰ 錢門塘市的靜逸軒，「中有避囂處、瑞雲峰諸勝」，「門雖近市，入之繚而曲，有廊曰避囂處，係明婁先生堅舊題。」⁵¹ 又像唐棲鎮中的東園：「東園者，在塘棲里第之東，逼市塵而不喧，積石幽峻，嘉樹列植，間以名花灼灼，雜草迷迷，當其豐叢，藉軟如氈，若坐深谷中者，更有曲水，照排甃為橋，入於高堂之上，堂分四簷，皆通戶牖，雖無瑠瑯，而宏敞清麗，所見無比。」⁵² 黎里鎮的且園，「凡園中一山一石，皆如為山堂供養，當夫曉雨初晴，空翠欲滴，恍置身堯峰上下間，幾忘其地在塵市中也。」⁵³

也有例子顯示正因為園主是好「遊」的士人，所以選擇風景佳又距離不遠的市鎮興築園第，以滿足其「遊」的欲望。如吳江縣震澤鎮在明代有復古桃源，係通判沈有光所築，明人莊憲臣有〈桃源小隱記〉，記載沈有光在此建園第的原因：

沈先生時時為不佞言，余薄遊二十年，凡天下之奇觀，極之懸車束馬，跼蹐挂猿之險，靡不身歷，乃山水之與鬱勃於中，已老而倦游矣。雖然苟適所適，安知扶搖為遠，而榆枋為近，請得為小隱。於是構地於堂之北，而規為園，引水為池，累石其陽，……登而四顧，則古剎左右峙，而洞庭兩山若列屏南，則舍宇連雲，遙望帆檣游移其顛，如王子出師旗旒，央央也。⁵⁴

沈有光喜好旅遊山水，至年老時選擇距離不遠，又位置可觀風景之地，所以就在震澤鎮構築園第。有不少市鎮的園第就建築在適合觀賞風景的位置，如湖州府烏程縣的南潯鎮，在東柵道院總管堂後西偏有留雲閣，清人沈登瀛(1795-1842)〈留雲閣圖記〉中提到：

道光庚寅(10年, 1830)之冬，盛澤乃徵君春水來寓於茲，因造訪焉。登而四眺，頗極軒敞。西則市廛鱗次，而不染囂塵；南則帆檣出沒，往來於俄頃間，而無風濤之險；東北則平疇千畝，碁布星羅，洞庭兩山若列屏障，震澤浮屠亦可指點而得登臨，風景四時皆宜，相與歎賞者久之。⁵⁵

圖記中一樣提到該處離市廛近，卻不染囂塵，又是風景四時皆宜的好地方。總之，離市不遠，風景又美，就是築園第的絕佳位置。

從園第建在市鎮的現象，又會涉及到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城鄉關係的問題。過去明清史學界的研究已經證明了明代中葉以後，出現鄉居地主移居城市的現象，這也就是日本學界所謂「鄉紳論」的重要發現之一。⁵⁶ 在江南不只是有鄉居地主遷移到城居，也有

⁵⁰ 清 仲沈洙、仲樞增纂，乾隆《盛湖志》，卷下〈園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據乾隆三十五年刻本影印，1992，冊11，頁8b。

⁵¹ 民國 董世高編纂，民國《錢門塘鄉志》，卷4〈名蹟志·宅園亭〉，頁55-56。

⁵² 清 王同纂，光緒《唐棲志》，卷5〈志遺蹟〉，頁11a。

⁵³ 清 徐達源纂，嘉慶《黎里志》，卷4〈古蹟·園亭〉，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據清嘉慶十年吳江徐氏孚遠堂刻本影印，1992，冊12，頁10a。

⁵⁴ 清 紀磊、沈眉壽纂，道光《震澤鎮志》，卷5〈園第〉，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據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影印，1992，冊13，頁4b-5a。

⁵⁵ 民國 周慶雲，民國《南潯志》，卷1〈宅第二〉，頁2a-2b。

⁵⁶ 日本學界在1950年代開始了關於中國紳士層的研究後，「鄉紳土地所有論」成為其討論的重要焦點之一。首先是北村敬直提出明初的「鄉居地主」，到了明末清初開始轉變成「城居地主」。接著安野省三又修改了北村氏之說，他認為明末清初出現的城居化、不在地化傾向的大土地所有者，是和紳士屬於同一階層的社會階級，所以「城居地主」應改稱為「鄉紳地主」。小山正明則進一步提出了一種假設，他認為自明代後期到清初，國家對土地所有面的支配體制已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過去握有社會支配身分的形

移居到市鎮，或是由市鎮再移居城市的情形。⁵⁷而從一些例子看到有的在市鎮的家族移居到城市中，但即使是在城市已擁有園第的者，也可能會在市鎮另建一個園第。如松江府青浦縣朱家角鎮內的望族陸氏，據嘉慶《珠里小志》記載明代時有陸彥楨在府城內建有別業，至其孫陸慶紹中舉後，又在鎮內建第宅，名為「濯錦窩」。⁵⁸又如嘉慶《石岡廣福合志》記當地幾位重要的「先達」云：「先達如須日華、吳鐵庵等俱祖居我里，通籍後始置別業於城中。即王補亭未巖，少年讀書故里，壯歲亦半城半鄉。」⁵⁹這裡所說的須與吳二氏祖居市鎮中，迨中進士後始於城市中營建第宅，還有像王未巖也是「半城半鄉」，可見這些家族的活動範圍很廣，在城市與市鎮之間往來非常頻繁。

第三節 江南市鎮地域文化的塑造

明清江南市鎮中的〈園第志〉除了呈現客觀的現象之外，卻不能忽略了它的主觀意圖。方志的作者在撰述動機上也有其主觀的目的，因此我們應該進一步地追問記載〈園第志〉的目的，以及〈園第志〉書寫所反映的意義。特別是對當地人而言，具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再者，〈園第志〉在作者有目的書寫下，是否作了選擇性的記錄呢？上述問題是本節探討的重點。

為何記載園第的歷史？

競築園第的現象可以說是晚明以來的奢靡風氣下的產物，卻也是士大夫崇尚節儉的反面教材。⁶⁰因為園第的衰敗正可以提醒世人窮究奢華的下場，要不是富不過三代而轉手，就是引起後代對家產的爭奪。晚明以來已有不少士大夫認為應該以此為戒，⁶¹在明

勢戶、糧長層，已由鄉紳層取代。參見北村敬直，〈明末・清初における地主について〉，《歷史學研究》，號140，1949，頁13-25；安野省三，〈明末清初・揚子江中流域の大土地所有に關する一考察〉，《東洋學報》，卷44期3，1961，頁61-88；小山正明，〈中國社會の變容とその展開〉，《東洋史入門》，東京：有斐閣，1967，頁50-55。其它相關的研究回顧，另可參考吳金成，〈日本における中國明清時代紳士階層研究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號7，1979，頁21-45；檀上寬，〈明清鄉紳論〉，收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二卷 明清」，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453-483；于志嘉，〈日本明清史學界對「士大夫與民眾」問題之研究〉，《新史學》，卷4期4，1993，頁141-175。

⁵⁷ 相關研究參見石錦，〈明清時代桐鄉縣社會精華分子的社會組成和變化稿〉，《漢學研究》，卷3期2，1985，頁739-767。Mary Backus Rankin, "Rural-Urban Continuities: Leading Families of two Zhejiang Market Towns," *Ch'ing-shih wen-t'i*, 3 (1977), pp. 67-104.

⁵⁸ 清 周郁濱纂，嘉慶《珠里小志》，卷7〈第宅〉，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嘉慶三十八年版標點出版，2005，冊7，頁85-86。

⁵⁹ 清 蕭魚會、趙稷思編，嘉慶《石岡廣福合志》，〈凡例〉，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嘉慶十二年刻本標點出版，2004，冊1，頁1。

⁶⁰ Joanna F. Handlin Smith, "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 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 pp. 55-57.

⁶¹ 如張瀚(1510-1593)云：「余所聞先達高風如沈亞卿省齋、錢都憲江樓，皆身歿未幾，故廬已屬他姓。至如近者一二巨姓，雖位臻崇秩，後人踵事奢華，增構室宇園亭，窮極壯麗；今其第宅，皆新主矣。」清人陸文衡也說：「士宦顯盛，必求美宅，置園亭以為樂，不一再傳，子孫零替，輒為遊客借憩，官府布施之地，甚至有沒作官房，鞠為蔬圃者，轉眼桑滄，可勝太息。」袁景瀾亦云：「大抵豪貴子弟習睹奢靡，服鮮驕肥，萬錢下箸，不知撙節，遂至喪家。」參見明 張瀚，《松窗夢語》，卷7〈風俗紀〉，

清江南市鎮志中就有許多活生生的例子，如湖州府南潯鎮的且住園，最初是明代著名的禮部尚書董份所建，「更數傳而貧不能守，歸他姓，先王父破產，復之而撤其樓，樓址遂為荒土。久之，又更二姓。」⁶²松江府干巷鎮有曹光祿的後泉別墅，曹家兩世富甲於里，亭館盛於一時，但傳至玄孫時家道中衰，甚至不能舉火。⁶³杭州府唐棲鎮有呂氏家族，官至光祿、鴻臚寺，「當時賓客之盛，第宅之侈，甲於杭郡。今蕩然無存，後嗣能讀遺書者，亦寥落矣。」⁶⁴又如松江府法華鎮有北園，在道光年間因為家人不睦，無端拆毀園第的廳堂，後被富人沈氏購去重建。⁶⁵

於是在明清江南市鎮志的記載中，就有士大夫檢討這種誇示炫耀的園第，告誡金錢財富的無常、家業炫耀的無益，不如投入家族的慈善事業，更利於維繫家族的生命，以及社會秩序的長治久安。《烏青鎮志》有清人茅星來〈遊唐氏廢園記〉一文，作者親見唐氏園由興盛到荒煙零落，怪石奇卉與夫陂池臺榭之勝蕩然無存，遂有感懷：

假使當時以築園亭之費，建為義莊，則一族之人饗之矣；建為社倉，則一鄉之人饗之矣。夫既為一族一鄉之公有，而雖有子孫欲取而廢之，亦孰得而廢之哉？予之所為歎也。⁶⁶

確實也有一些市鎮的園第，在衰敗後改為公共用途的例子。如唐棲鎮在明末有進士吳邦相之子宏文，購諸園林建別墅，稱為「吳園」；但至清初，宏文殉節於福建，於是園第漸圯，「荒煙蔓草，垂三百年，居民佃賃，尼庵割據也久矣。」後仁和知縣高卓如為倡勵士風，乃於吳園故址創建棲溪講舍。方志稱：「昔年勝地，其興起之機乎！」⁶⁷

如果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競築園第既然是社會的反面教材，那麼為何又在江南的市鎮志中，特別載錄當地園林第宅的歷史？將園林第宅記錄下來具有什麼意義呢？那就得從文化史的角度來尋找答案，特別是地域文化的角度。

市鎮志裡〈園第志〉的開頭序言中，提到之所以載入園林第宅的原因，最常見的理由，就是供人發思古之幽情。如《法華鎮志》的〈第宅·園林〉志云：

先賢釣遊之地，後人所景仰也。名流嘯詠之場，逸士所深思也。菲故高閣大闕，

收入《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40；清 陸文衡，《喬菴隨筆》，卷5〈鑿戒〉，台北：廣文書局，1969，頁4a-b；清 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3〈三月·清開明園〉，〈袁景瀾春日遊吳郡諸家園林記〉，南京：江蘇古籍，1998，頁107。

⁶² 清 汪曰楨，同治《南潯鎮志》，志6〈古蹟一〉，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據同治二年刻本影印，1992，冊22下，頁15b-16a。

⁶³ 清 朱棟纂，嘉慶《干巷志》，卷3〈第宅 園林附〉，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冊5，頁37。

⁶⁴ 清 何琪纂，乾隆《唐棲志略稿》，卷下〈園圃〉，頁1a-b。

⁶⁵ 民國 胡人鳳續輯，民國《法華鄉志》，卷7〈園林·第宅〉，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1922年唐子涇胡氏鉛印本標點出版，2006，冊12，頁278。

⁶⁶ 民國 盧學溥，民國《烏青鎮志》，卷17〈園第〉，頁12b。

⁶⁷ 清 王同，光緒《唐棲志》，卷5〈志遺蹟〉，頁14b。私園衰敗後改建為公共用途的類似例子，如南翔鎮有猗園，原是明朝通判閔士籍所闢，後歸貢生李宜之。乾隆間又為洞庭商人葉錦得之重葺。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時，紳士們勸募捐置州城隍廟為靈苑於園內；至嘉慶十一年(1806)，紳士又勸募修葺。又如張堰鎮有康熙時戶部尚書王鴻緒之第宅，宅基極寬廣，清末的濟嬰局、文昌廟、巡檢署、姚氏宗祠等，皆其遺址。參見清 張承先著、程攸熙訂，嘉慶《南翔鎮志》，卷11〈雜誌·第宅〉，頁183；清 姚裕廉、范炳垣修輯，清末《重輯張堰志》，卷3〈志名蹟·園林〉，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民國9年松韻堂印本，2005，冊5，頁90。

附盛德而傳。一壑一邱，雖荒墟亦顯。盛衰興廢之間，流覽能無生禾黍故宮之感乎？志第宅園林。⁶⁸

引文中的「禾黍故宮之感」，本指周朝大夫經過故國宮室，看見滿地禾黍，而感慨周室的顛覆，典故出自《詩經·王風·黍離》，後用來比喻感念故國的情思。不過，在此還有另一層意義，即指感念故園之意。也就是說園林第宅不但是古蹟，也具有懷念故鄉的作用。又如湖州府晟舍鎮的同治《晟舍鎮志》云：

名園別墅，雅士遺蹤，高閣層樓，英賢寄跡。吾里昔也，亭臺相望，觴詠爭誇。今則第宅無存，桑滄誌感。若不探尋故址，恐年深而名勝遂湮。用是博採遺聞，冀垂久而幽情稍慰，庶不負古人之心跡，亦可使後世之追懷耳。⁶⁹

園林別墅被視為值得記憶的物件，所以該志中將園林別墅放在〈古蹟〉志中。不過，從上引文中看到作者強調：「吾里昔也，亭臺相望，觴詠爭誇」，顯見作者認為這些過去的園林第宅，不只是思古用的古蹟，也是地方上值得驕傲的物件。再如前文提到的乾隆《唐棲志略稿》中杭世駿所寫的〈序〉就說：「呂丁吳諸大姓，矯尾厲角，崢嶸於勝國之季，聲妓園林，號稱極盛」，明指該鎮的大姓所築之園林第宅，在明朝時曾盛極一時，是該鎮最值得驕傲的地方傳統，也是最值得記載的東西，即使已成遺跡或化為灰燼，故又謂：「下扁舟，來往憑弔，無由緬遺事而悲涼，續琴尊而闐寂，感慨繫之矣。」

有的市鎮志強調所記載的園林第宅，皆是孝子為奉養親老、娛親盡孝所築，是該地文化彰顯的特色。最好的例子是光緒《羅店鎮志》的〈園林〉志云：

羅店亦一鄉耳，本無園亭之勝、林木之觀，是烏足以誌。然事出孝子之所為，雖一壑一邱亦堪景仰，地經名流之所過，雖一木一石不盡流連，至若栽名花、疊奇石，月夕風晨賓朋宴會，亦極一隅之勝，概豈必如摩詰輞川、石崇金谷，然後可以傳往昔而示來今哉！⁷⁰

作者強調該市鎮志之所以記載園林，並非是該地園亭林木有任何誇示可觀之處，而是出自孝子名人的孝行所營建的園林，正可以「傳往昔而示來今」。在該志中就記有多例園林，如思圃是乙酉之變時，該鎮名人范國楨與次子光昭殉難處。後國楨長子光啓即於其地闢圃，建祠其中，命名為「思圃」，「蓋痛其父兄之捐軀於斯土而思慕不忘，冀其神之得所依也。」⁷¹其它的市鎮志，也有許多類似的例子。⁷²

⁶⁸ 清 金祥鳳抄補，《法華鎮志》，卷5〈第宅園林〉，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鈔本標點出版，2006，冊12，頁77。

⁶⁹ 清 閔寶梁纂，同治《晟舍鎮志》，卷2〈古蹟〉，頁1a。

⁷⁰ 清 潘履祥總纂，光緒《羅店鎮志》，卷3〈園林〉，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清光緒十五年鉛印本標點出版，2006，頁145-6。

⁷¹ 又記龍川小築，為太學生陳浩闢為娛親之處，參見清 潘履祥總纂，光緒《羅店鎮志》，卷3〈園林〉，頁146-147。

⁷² 如嘉慶《朱涇志》中的寄閒別墅，初名西園，係該鎮人程維岳之高伯祖白山公所建，「雍正間，大父陳情請養，奉我曾大父文翼公遊憩其中，夏清冬溫，頗得循陔養志之樂。」道光《震澤鎮志》記某漪亭為清人莊兆鈞所居，「於竹林中特構，以奉母，故名。」民國《烏青鎮志》記有「少司寇沈應龍宅」，「宅西者曰西園，中有怡老堂，前牡丹臺，後四桂亭，果齋，華嵩兩封翁娛老處也。」另記有高節寒香圃，「處士張園真置以奉嫠母吳孺人者。」參見清 朱棟纂，嘉慶《朱涇志》，卷4〈名蹟志·園林〉，頁53-5；清 紀磊、沈眉壽纂，道光《震澤鎮志》，卷5〈園第〉，頁7b；民國 盧學溥，民國《烏青鎮

即使沒有提到上述理由的市鎮志，也有一個最簡單的說法，也就是這些名人第宅正是地方上最寶貴而重要的文化傳統，所以不能忽略。嘉慶《珠里小志》〈第宅〉又說：「名人之宅，君子之廬，與夫寓公逸士之居，興廢靡常。而地以人重，不可略也。」⁷³其實名人或名流之第宅也一樣是「興廢靡常」，但對方志作者而言，正是「地以人重，不可略也」。所以突顯地方名人的事蹟，可以作為地域文化優越性的表徵，就像嘉慶《干巷志》〈凡例〉所云：「至《第宅》、《寺觀》，不憚詳考備書者，亦足增斯里之光，並以補邑志所缺。」⁷⁴

甚至在某些市鎮志將該地園第描寫成爲一縣中之最者，如蘇州府羅店鎮中的友蘭別墅，係明人沈文淵闢，「中有郎照堂，係宗室德成題。堂前羅列奇石如峽，翠雲豹、觀音峰皆玲瓏透闢，其最著者名醉石，高丈餘，望之如醉人傾頽，狀擅一邑之勝。」⁷⁵甚至可與城市內的園第相媲美，如太倉州嘉定縣的方泰鎮，鎮中有王在庵所建的非園，「園之小，不盈五畝，樓榭亭臺類皆不雕不琢。惟花木之盛，培護歷二百年，蒼秀爲一邑冠。」當時在縣城有著名的侯氏菴園，一時名士皆從之游。而王在庵也在課經餘暇，與諸名士詩酒唱和於園中，遂有謂：「非園勝概，不減於菴園。一在城，一在郊，兩相得而名益彰。」⁷⁶有些市鎮的園第的確已可與城市園第相提並論，如《吳郡歲華紀麗》指出蘇州府的名園，除了城內的園林之外，城外的木瀆鎮有錢氏端園、潛園，「地接靈巖，春時遊人畢集，凡此數處皆吳郡園林之著聞者也」。⁷⁷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地推敲市鎮志的作者編纂志書的目的，就是爲了塑造地域文化的優越性，甚至有與城市文化一爭長短的味道。

選擇性記載的園第志

那些園林第宅會被列入市鎮志的記錄中呢？是否市鎮內所有的園第都會被具體地載入方志中呢？若仔細觀察市鎮志中所記載的園林第宅，將會發現營建園第的主人除了士大夫以外，其他身分者所佔的比例相當少，事實應非如此簡單。從第一節曾述及明清江南營建園第的風氣如此盛行，只要擁有相當財力的商人與地主，都應該會想到興築園第。許多江南市鎮形成的原因，既然是與工商業的發展有關，那麼可以想像有不少經營工商業致富的有錢人，也會築園第才是。例如唐棲鎮有尙本樓，爲明天啓間呂皋所建；而呂君的生平據邵銳〈尙本樓記〉云：

抗之仁和，去邑治七十里許，地名塘棲，有呂君者居之。君名臬，字用深，自幼

志》，卷17〈園第〉，頁7a、15b。

⁷³ 清 周郁濱纂，嘉慶《珠里小志》，卷7〈第宅〉，頁85。

⁷⁴ 清 朱棟纂，嘉慶《干巷志》，〈凡例〉，頁2。

⁷⁵ 清 潘履祥總纂，光緒《羅店鎮志》，卷3〈園林〉，冊11，頁147。

⁷⁶ 清 王初桐纂輯，嘉慶《方泰志》，卷1〈園亭〉，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嘉慶十二年刻本標點出版，2004，冊1，頁18-19。

⁷⁷ 清 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3〈三月·清開明園〉，頁106。

以辛苦起家，早作而晏息，厚簣而薄施，畜之數之，遂隱然以資雄一鄉。其故居僅足以自容，乃謀拓隙地數畝為樓，以宴賓客，樓楹間有三。君初議是舉也，嘗曰苟則可繼，且上下有等，吾安吾分而已。故其制度以朴以堅，雕黜咸弗事也。經始於弘治乙丑歲六月十月六日，迨丙寅四月初六日落成，君之心恐莫白於後，扁以尚本，其友菊莊王君，領其扁之意，屬予記之。⁷⁸

雖然作者寫得很保守，並不明講呂君是以何業起家，但絕對與工商業脫離不了關係。再如吳江縣黎里鎮有德星堂，為處士蔡宏裕所築，據云：「蔡君孝事父母，終身無違顏，然家苦貧慮無以為養，不得已而為治生計，甘旨賴以無闕厥，後家日隆」，於是「為堂於里之南，臨禊水傍疏林，結構幽致。」⁷⁹蔡君的職業可能就是商人。又如方泰鎮早在明正德年間有陳員外者，「榮富甲里中，營第宅，構園亭，建牌坊，極一時之盛。後即蕭索，第宅園亭盡為平地，子姓亦凌替殆盡，僅沿一線。所留遺至今者，惟牌坊而已。」⁸⁰但是這類的記載很少，光緒《周莊鎮志》記載的一則故事，透露出有趣的訊息：

鎮西園盛姓，多財好勇，康熙壬申，謀佔鄰人房屋，誣陷繫獄，賄通邑令，揚言將置之死地。鄰母懼，遂縊死。令來鎮檢驗，盛復夤緣屬令，欲枉法。鎮人不平，群起喧嘩，爭擲以瓦礫，令遁去，草草結案。未幾，以貪墨去官，客死郡城，盛亦子孫蕭索矣。⁸¹

這則故事載在〈雜記志〉中，描述市鎮內豪強佔人家屋的情形，說明了應該還有許多平民富人所建園林第宅，不過方志的〈園第志〉並不列入。

還有一些例子顯示，即使園第主人的身分並非士大夫，卻常被描繪成文人儒士的行徑，如嘉定縣的方泰鎮自嚴氏家族來此開發市鎮商業後，市鎮愈益興隆，晚年嚴氏築第宅「花雨樓」以禮佛，故俗名「佛樓」。有文人王璣《顏贈花雨樓記》描寫「嚴子」的形象：

有嚴子自羅溪來，與陳皓如卜鄰，浩如遂授廬焉，已三十餘年矣。夫此三十餘年之前，入其境，市井蕭條，誦讀無聞。嚴子才智過人，首發萌孽。二十年之生聚教訓，僉有成功。凡貿易而成市，絃歌而臻教者，浸浸有化醇俗美之勢。謂非創始者之功乎！⁸²

這裡的嚴子形象如同一位儒商，既能「貿易而成市」，又能「絃歌而臻教」。其實嚴氏與陳浩如兩家皆是「以猗頓之術起家」，也就是皆以商人起家。⁸³又如光緒《唐棲志》載有里人邵鶴亭所構之「半畝園」，中有玉玲瓏館，兩山環水，搏製砂壺名重一時的程明遠曾寓居於此。⁸⁴這位邵鶴亭並非士大夫，但他建園林又優禮工藝匠人長居，就如同

⁷⁸ 清 王同，光緒《唐棲志》，卷5〈志遺蹟〉，頁5-6。

⁷⁹ 清 蔡丙圻纂，光緒《黎里續志》，卷3〈古蹟·園第附〉，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據清光緒二十五年楔湖書院刻本影印，1992，冊12，頁9b-10a。

⁸⁰ 清 王初桐纂輯，嘉慶《方泰志》，卷1〈發凡〉，頁2。

⁸¹ 清 陶煦，光緒《周莊鎮志》，卷6〈雜記〉，頁9a。

⁸² 清 王初桐纂輯，嘉慶《方泰志》，卷1〈第宅〉，頁17。

⁸³ 清 王初桐纂輯，嘉慶《方泰志》，卷1〈發凡〉，頁2。

⁸⁴ 清 王同，光緒《唐棲志》，卷5〈志遺蹟〉，頁33a。

士大夫在園林招養清客一般。還有所謂的「處士」修築園第，偃然一派名士的風範。如吳江縣盛澤鎮有處士王楠的話雨樓，「藏金石書畫於樓，名流張瓜田，金冬心、沈凡民、任退谷、張文魚，時過從焉。」⁸⁵

真正算是儒商的，應該是烏程縣南潯鎮的施國祁(1750-1824)，字非熊，號北研，諸生，著有《金文詳校》。施君家極貧，少嘗授經于外，亦習朱墨計然之法。中年忽廢學於市隱，為姻家盛氏經理商業，設吉貝肆，中有小樓一，即顏曰「吉貝居」，自云在治生之餘，「間以讀書，讀書之暇，繼以吟詠。肆後有小室，縱廣不及二尋，胡床桌椅，可以延客，中有扁題曰『吉貝居』，志本業也。」當時還有人撰〈吉貝主人傳〉，將施君形容成看似貨吉貝的市肆商人，卻有深藏不露的學問。⁸⁶

至此我們不得不懷疑，市鎮志中的〈園第志〉是選擇性的記載。我們再回頭檢視市鎮志中〈園林·第宅〉的序言或〈凡例〉，據光緒《羅店鎮志》〈第宅〉開宗明義就指出：

門閭高大，世俗所誇，然或再過而為墟，或數傳而易姓，君子慨焉。夫齊相之宅，湫隘可居，武侯之廬，草茅自適。百世而下，雖遺址無存，考古者猶將於荒榛斷梗中指而數之，曰此昔時某某之所居也，則信乎室陋在於德馨正，不必以連雲甲第為美也，況吾鎮名流舊宅至今未盡鞠為茂草乎，是不可以不誌。⁸⁷

上引文中強調所記錄的第宅並非盡是誇示者，反而是這類「門閭高大」、「世俗所誇」的第宅，很快就可能因家道中衰而淪為廢墟，或轉手流為易姓所有；所以要記錄的是「吾鎮名流舊宅」，「不必以連雲甲第為美也」。光緒《周莊鎮志》〈凡例〉更加明示：

第宅必係名人所居，或為前輩社集之所，著有詩文傳播當時，始行采錄。⁸⁸

可見該志所載之園第，必定是名人所居，或是有詩文社集及詩文傳世的「文人化」園第。這種選擇性記載的標準並不只有《周莊鎮志》一書而已，而是普遍的現象。

然而，這類「文人化」的園第也會因為家道中衰，或是家內不再有讀書與功名者，使得園第終歸易手。當某文人化園第轉手給「某氏」之後，〈園第志〉就不再記錄了。如張堰鎮的奎藻堂，俗呼「金廳」，為康熙年間的歲貢生楊銘鼎所有，後歸錢氏暨海鹽周氏別業，之後就不再記錄。同鎮的亦園，為該鎮廩生汪逢堯所築，汪氏歷多縣訓導，有政風，多士獻「時雨化之」額，為當時所少見。園中有八景，並有文士歌詠以詩，但「今廢，遺址歸楊氏。」⁸⁹法華鎮的香花草堂，為太學生張德基植牡丹處；「花時遊屐填集，信宿流連，以歌詩投贈，彙成卷帙。子仁耀，亦瀟灑能詩，故座上多知名士，張宮詹鵬翀，其族也，歲或一再至。云今地已易王氏居，而花之。以郡望著者，遠近無異辭焉。」⁹⁰這個園第轉手到王氏，還記有王氏的貢獻，因為王氏為郡望著者，所以「遠

⁸⁵ 清 仲廷機、仲虎騰纂，光緒《盛湖志》，卷5〈園宅〉，頁9a-b。

⁸⁶ 民國 周慶雲，民國《南潯志》，卷9〈宅第一〉，頁7a-8b。

⁸⁷ 清 潘履祥總纂，光緒《羅店鎮志》，卷3〈第宅〉，頁143。

⁸⁸ 清 陶煦，光緒《周莊鎮志》，〈凡例〉，頁2a-b。

⁸⁹ 清 姚裕廉、范炳垣修輯，清末《重輯張堰志》，卷3〈志名蹟·園林〉，頁90、94。

⁹⁰ 民國 胡人鳳續輯，民國《法華鄉志》，卷7〈園林·第宅〉，頁281。

近無異辭焉」，顯然是說如果轉手到一般人，就可能會遭非議。嘉慶《石岡廣福合志》記有一名園石岡園，原本是明萬曆間歲貢生沈紹伊所闢，不久轉屬布政使龔錫爵，清朝時歸為「蘇氏園」，僅存董其昌所書之「石岡草堂」額。有貢士婁堅撰〈溪山堂詩序〉記龔錫爵愛園之甚，又有沈氏後代沈徵侗撰〈石岡園記〉云其歷史，然而此二文不載該園後歸蘇氏里人，又稱為蘇氏園的歷史。⁹¹雙林鎮的姚氏園原為姚柳塘開文家墅，市鎮志記：「頗饒花木，咸豐間園售於陳氏，遂廢。」⁹²似乎該園轉手到陳氏後就廢圮了。上述的這些購買主諸「氏」，很可能就是富商地主。市鎮志的作者眼中，一旦流入他們之手，這個文人化園第的生命也已結束，該園第的歷史至此已別無可書之處。雖然在市鎮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到一些園第轉手到商人的掌握下，園第就變調了，轉變成商業用途；⁹³但這些例子並不足以說明所有的文人士大夫園第轉手到商人富戶後，就會完全改變其原貌。

如果是轉手到士大夫或官員，就大書特書這些人如何愛習園第花木，更加致力於經營園林之美。如同治《晟舍鎮志》記鎮中有且適園，為明嘉靖進士，官至兵部員外郎的凌道知(1529-1600)所建；「尋以事歸閔大司馬夢得（按：閔夢得曾任兵部尚書），易名適園。大司馬致仕後，作歸來堂，繚以周垣，佐以名花，為游息觴詠之所。登其石，則西北諸山環拱於右，俯瞰渚漾，波瀾微動，荇藻交橫，亦殊清曠幽雅。」⁹⁴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民國《法華鄉志》中關於東園的記載，東園原係貢生李炎以益都縣丞的別墅擴為園，待李炎身歿後，「園丁不知愛，已析為薪」；隨後被大理評事李丙曜、中書李應堃昆仲所購，「增飾池館、架曲廊，以通舍北之露凝深處。四時花木、欄檻紛披，春暮牡丹尤盛。」⁹⁵當園第轉手至沒有功名身份的人時，新園主會被描述成不懂愛習花木的俗人。如乾隆《干山志》載有環山草堂，係吳子達所建，志云：「小橋流水，直北抵山足，地幽景勝，子達種竹養鶴，讀書其中。後歸沈醴泉，雖亭臺去半，而花木益茂。兩君百年後，培植之樹木竟落俗子之手，斬削一空矣。」顯然作者只認為該園在吳子達與沈醴泉在時，是亭園的黃金時期，到了轉手落到俗子之手必會遭殃。⁹⁶

⁹¹ 清 蕭魚會、趙稷思編，嘉慶《石岡廣福合志》，卷1〈建置考·園林〉，頁15-17。

⁹² 清 蔡蓉升原纂，民國 蔡蒙續纂，民國《雙林鎮志》，卷11〈古蹟·名勝·名勝題詠附〉，頁7a。

⁹³ 如錢門塘市的培實堂，為姚王素築，這位宋文正公湘之後裔，於明季徙鎮中，廣闢園亭，至滿清入關後則杜門謝客，人以高士目之；而他一手興築的培實堂，「清嘉道間售歸秦氏，改設質庫。」又如南潯鎮大宗伯第，係明代著名的禮部尚書董份所居。董氏家至清道咸時已衰落，其宅中大開博場，甚至有輪者死於後園池中。至咸豐時燬於兵燹，全宅灰燼，同治時改建平房，曾開設茶肆；至光緒中轉手給金、邢二氏。也有的淪為民居，如濮院鎮的趙家園、朱家園與徐家園，至清中葉盡析為民居，「民居每一園為一圈，多至百家，少亦不下數千家。」參見民國 童世高編纂，民國《錢門塘鄉志》，卷4〈名蹟志·第宅園亭〉，頁54；民國 周慶雲，民國《南潯志》，卷9〈宅第一〉，頁1b；清 金淮纂，濮鎮續纂，嘉慶《濮川所聞記》，卷2〈園圃〉，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據清嘉慶二十五年續纂刻本影印，1992，冊21，頁37a。

⁹⁴ 清 閔寶梁纂，同治《晟舍鎮志》，卷2〈古蹟〉，頁3b。

⁹⁵ 民國 胡人鳳續輯，民國《法華鄉志》，卷7〈園林·第宅〉，頁276。

⁹⁶ 清 周厚地輯，乾隆《干山志》，卷6〈第宅〉，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松江博物館藏抄本標點出版，2006，冊9，頁72。

總之，〈園第志〉的文本有選擇性地大量記載士大夫所建，或符合其品味標準的「文人化園第」；同時也略去不載一些園主非士大夫身份，或不符上述品味標準的園第。

第四節 江南市鎮「文人化園第」的建構

既然市鎮志的〈園第志〉是經過選擇性記載的文本，為的是塑造地域文化的優越性，那麼〈園第志〉所要建構的「文人化園第」又是什麼？本節嘗試透過〈園第志〉書寫所強調的兩個面向，一是在園第所舉行的文藝活動，一是園第所具備的幾種物質文化；前者是動態的活動，後者是靜態的物件，藉此來說明「文人化園第」建構的模式。

文人化園第中的文藝活動

至於市鎮志中所描述的「文人化園第」最突出的特色是什麼呢？那就是園第中舉行的各種文化活動了。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到在市鎮志中記載許多園主，常以園第來招待文人雅士遊觀，藉此與他們相結交。如朱家角鎮的怡園，在瑚階港後街，係行人司行人吳普之別業，當地重要的文人一一舉人陸慶臻(1613-1693)將該園列出十二景，「四方賢士大夫拏舟來訪，幾無虛日。」⁹⁷嘉興府桐鄉縣烏青鎮有蠡勺園，宅後有流杯亭、滴翠樓、曲水平橋，以供遊憩，園主之子及孫復加修葺，「時與文人學士觴詠其間」。⁹⁸廠頭鎮的杏園，為明人胡氏所闢，「園有亭有池，有臺有榭，而隙地悉栽紅杏，花時香聞十里，士人讌集，題詠滿中，為廠頭八景之一。」⁹⁹朱涇鎮有寄閒別墅，嘉慶《朱涇志》的作者朱棟撰有〈春日與諸同人重集寄閒別墅〉詩，當時同集者程錫九、顧蘭谷、嚴舫魚，童閩峰等諸君也。¹⁰⁰黃渡鎮的詠歸草堂，「康熙己丑，里中夏時中首唱《滿江紅》詞，同人反覆疊賡，為一時佳話。」¹⁰¹

也有許多園主和多位在地的文人在園第中結成詩文社，互相唱和。如南翔鎮有猗園，明貢生李宜之所築，並撰有〈猗園〉詩云：「此時文酒社，家釀許同斟。」¹⁰²明代的例子以周莊鎮最多，如四留草堂，為明朝庠生戴之佐所居，「崇禎間與楊廷樞、朱隗、葉襄、魏風諸名流結文社於此。」文郁堂，明長庠生屠彥徵之宅，嘗與陶唐諫、僧廣明夷人等，仿香山故事，結「耆英社」，極一時詩酒詩樂。怡順堂，為明長庠生徐汝璞之宅，時與「耆英社」諸老宴集於此。¹⁰³明清之際到清初的例子，如望仙橋市有徐濱行館，

⁹⁷ 清 周郁濱纂，嘉慶《珠里小志》，卷7〈第宅〉，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嘉慶三十八年版本標點出版，2005，冊7，頁87。

⁹⁸ 民國 盧學溥，民國《烏青鎮志》，卷17〈園第〉，頁16a。

⁹⁹ 清 錢以陶著，同治《廠頭鎮志》，卷3〈古蹟·宅第園亭附古物〉，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同治七年刻本出版影印，2004，冊3，頁37。

¹⁰⁰ 清 朱棟纂，嘉慶《朱涇志》，卷4〈名蹟志·園林〉，頁55。

¹⁰¹ 清 章樹福纂輯，咸豐《黃渡鎮志》，卷9〈雜類上·園第〉，頁150。

¹⁰² 清 張承先著、程攸熙訂，嘉慶《南翔鎮志》，卷11〈雜誌·第宅〉，頁184。

¹⁰³ 清 陶煦，光緒《周莊鎮志》，卷2，頁23a-23b、24b。

即秦氏墓廬，「來山張先生避亂授徒其中，嘗結煎茶詩會，時天福、陸少唐、仁龍盛藝菊於鴨闌，陸季雲麟錫首唱《詠菊》三十律。」¹⁰⁴雙林鎮的非園，「康熙間，鈕匪石築書齋，背枕石溪，庭前數弓地編花峙石，自稱非園，結花社唱和」；涉園，「康熙戊子柴東岡懋揆築，花塢藥欄，秋菊更盛，多至百數十品，與同社諸子賦詩其中。」¹⁰⁵嘉慶《石岡廣福合志》描寫清初直到清中葉，該鎮詩文會以園林為聚集地點的情形：

順治初，王泰際每招騷人於東臬雅集，陳瑚、諸士儼、趙世鼎、蘇震、陸元輔俱至。趙克聲有句云：「雲裳舊羨人文北（先朝縉紳，北里為盛），風雅新興我道南。」蓋指此也。康熙間，趙俞宦歸紺寒亭，每年人日，有澹成社，又有尋樂社。乾隆間續舉於趙丕烈，以「人日邀賓成故事」為起句，王元勳、俞昌言、王初桐、趙曉榮、國榮等皆有詩，今散見於諸人集中。¹⁰⁶

這種情形持續到晚清，如南潯鎮的潯園，同治季年陳熊所築，其子陳詩與海寧管鴻詞、郡城邱含章等多位文人，先後結「江村吟社」於園中。¹⁰⁷光緒《周莊鎮志》作者陶煦自家亦建有園第，名為棠巢吟館，為陶煦之姊婿戴其章及其弟陶其相讀書處，其所結之詩社遂稱為「棠巢吟社」：

（棠巢吟館）庭有鐵幹蓮花海棠一株，高出簷表，每歲花開極盛，輒邀同人宴賞。道光丙午（二十六年，1846）春，其章、其相並其兄子肇晉與煦，及家弟燾兄子甄，奉韓先生來潮為領袖，結詩社於花下，名曰「棠巢吟社」，自是七人迭為賓主，互相倡和，積數年得詩六百餘首。

同里還有綠雪軒，為韓來潮所構宅，時與棠巢吟社諸人宴集其中。¹⁰⁸由上述諸例說明了在市鎮園第的文人結社活動，自明歷清有其延續性。雖然過去的研究已指出明清易代之際，一因清廷的禁令，一因士人的反省，曾使文人結社的風氣中斷。¹⁰⁹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士人結社的傳統仍持續存在，也是明清文化的主流。

詩文社會將這些唱和的詩文集結，並以園第的名稱當成詩文集的書名出版。如唐棲鎮在明代後期可見市鎮園林中雅集詩社之盛況，並有詩文集出版：

按卓氏之傳經堂與芳杜洲，張半庵之遂初草堂與臥痴樓，在當時各有專集，今雖散佚，而詩文見存者，尚不下百餘篇。……以詩樓水當日詩壇吟社風雅之盛，並以見先輩之流風，餘韻歷久猶存也。¹¹⁰

¹⁰⁴ 清 張啓秦纂輯，光緒《望仙橋鄉志稿》，〈古跡〉，頁143。

¹⁰⁵ 清 蔡蓉升原纂，民國 蔡蒙續纂，民國《雙林鎮志》，卷11〈古蹟·名勝·名勝題詠附〉，頁4b-5a。

¹⁰⁶ 清 蕭魚會、趙稷思編，嘉慶《石岡廣福合志》，卷4〈雜類考·軼事〉，頁149引《古藤軒雜錄》。

¹⁰⁷ 民國 周慶雲，民國《南潯志》，卷11〈園林〉，頁12a。

¹⁰⁸ 清 陶煦，光緒《周莊鎮志》，卷2，頁29a-29b。

¹⁰⁹ 清順治九年、十六年、十七年與康熙二十五年分別有禁令嚴禁士大夫結社，見清 余正燮，《癸巳存稿》，卷8〈釋社〉條，台北：世界書局，1977，頁243-44。關於清初士人對結社的反省，參見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iam J. Peterson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頁441-451。

¹¹⁰ 清 王同，光緒《唐棲志》，卷5〈志遺蹟〉，頁27a-27b。

同鎮還有雁樓，為徐士俊野君築，「時棲里有詩社，四方才士，常主其家，晚年輯其所作詩文，曰《雁樓集》。」¹¹¹在市鎮志中記載許多園第築成後，主人邀約各方名士，徵海內名人書畫詩詠，編輯成冊出版。如望仙橋市有醉雪仙窠，係王氏別業，種有梅樹繞屋，陸遵書繪有園圖，名流題詠甚眾。後來由張世銑葺而擴之，改署名為「東園」，別稱「梅花小墅」，又徵海內名人書畫，各成卷冊。¹¹²又如望仙橋市有長春草廬，係張氏別業，太倉孫文學某曾於此授徒良久，曾以張氏別業中之「定川草堂」為題，徵繪圖與詩文。¹¹³錢門塘市有耕餘小憩，係清人秦垚奎所闢，道咸年間，垚奎及其門人許立勳相繼結詩社於此，名流觴詠，稱盛一時；垚奎刊有《耕餘小憩圖詠》二卷。¹¹⁴松江府婁縣的干巷鎮，在明代有園林名小蘭亭，係某知府所築，崇禎中有告歸終養之禮部侍郎曹勳於此舉詩社，凡十六人與焉，一時倡和甚盛，並有《小蘭亭倡酬集》行世。¹¹⁵羅店鎮內的龍川小築，為國子監生陳浩所闢為娛親之處，有六宜亭、在樂槃、清涼詩窟、海棠寮、蘋香水榭諸勝，中多牡丹，花時輒招名流觴詠，輯成《六宜唱和》一書。¹¹⁶

附帶值得一提的，在清代江南市鎮中還可以看到園第內有為閨秀才女專屬的空間，如松江府法華鎮志記載鎮內嘉蔭堂東偏有「醉墨舫」，為鎮內太常博士李鍾元繼室潘淑吟詩讀畫之所，因為是特別為才女所建，故風格迥異：「額係邑人喬鍾吳為李閨齋書。舫中有六角花牆，兩面鏤空，人物花卉，栩栩如生。天花板堊，以五彩瓜果之屬，無不維妙維肖；紗格等雕琢之精，世所僅見，相傳為名匠陸德山所製。」¹¹⁷據載潘淑，字冰蟾，號玉磬山女史，浙江舉人、任江蘇蕭縣知縣潘鎔女，能詩善畫，還著有《綠窗吟詠》一書。同書還載有另一位才女吳芝瑛(1868-1934)，而其與夫婿廉泉所建之園林第宅中，亦見有中外士女唱和之情景：

小萬柳堂：金匱舉人廉泉與妻吳芝瑛偕隱所，有帆影樓諸名勝。廉、吳以詩、書、畫名海內，古帖古畫，家多珍藏。中外士女來訪者，觴詠品題，殆無虛日。¹¹⁸

看來閨秀才女不但在園第內有其特殊的空間，而且也有她們自己的文藝活動。

上述的這些文藝活動，充份說明了建構文人化園第的動態模式，從邀請文人雅士遊觀園第、與地方名士結詩文社、進而將著作出版等方式，這不但是一種文化名聲的建構以外，其實也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建構，才能將園第及其主人的聲望與影響力量擴大。

¹¹¹ 清 何琪纂，乾隆《唐棲志略稿》，卷下〈園圃〉，頁9b。

¹¹² 清 張啓秦纂輯，光緒《望仙橋鄉志稿》，〈古跡〉，收入《上海鄉鎮舊志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據1992年上海書店影印本標點出版，2004，冊2，頁134。

¹¹³ 清 張啓秦纂輯，光緒《望仙橋鄉志稿》，〈古跡〉，頁137。

¹¹⁴ 民國 童世高編纂，民國《錢門塘鄉志》，卷4〈名蹟志·第宅園亭〉，頁63。

¹¹⁵ 清 朱棟纂 嘉慶《干巷志》，卷3〈第宅 園林附〉，頁35。

¹¹⁶ 清 潘履祥總纂，光緒《羅店鎮志》，卷3〈園林〉，頁147。

¹¹⁷ 清 胡人鳳續輯，民國《法華鄉志》，卷7〈園林·第宅〉，頁283-284。

¹¹⁸ 清 胡人鳳續輯，民國《法華鄉志》，卷7〈園林·第宅〉，頁286。

園林第宅內的物質文化

文人化的〈園第志〉的描述重點，除了上述的文化活動以外，還會常常提及園第內的一些特殊物件。以下就舉兩個例子，分別是松江府干巷鎮與湖州府晟舍鎮內的園第：

小西閣：在永壽道院右，曹別駕建。中貯圖史、名畫、古鼎彝。閣東偏植梅數十本，疊石穿池，饒有林泉之勝。¹¹⁹

竹深園：明閔節建，種竹千餘竿，疊石構事，聚異書、名畫、琴瑟、彝鼎，日與名流觴詠，歿即葬於此。¹²⁰

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到描述園第內的物件有兩類，一類是「裝飾物」，包括了奇石、異植（花草與樹木）、古物等；另一類是「收藏物」，如異書、名畫、古董等等。此外，〈園第志〉中也常花上半篇幅在描述一種「展示物」，特別多是題匾與石刻，如民國《烏青鎮志》載有明嘉靖時文人王濟(?-1540)¹²¹所築的橫山堂與寶峴樓：

橫山堂：在獅子巷北州判王濟宅，前為世恩堂濟父蘇州衛指揮英就宅。後治園左右亭臺間，列下流觴曲水，鐫刻精巧，蓋宋時物也。而濟自書其堂曰「橫山」，日與文人墨客歌詠倡和于其中。堂後築嘉樹亭，前置巨石，鄞人豐坊篆書扁，又有凝翠亭、蕭爽亭、羅春亭、黑猿塚。

寶峴樓：在橫山堂南，亦王州判築，有豐坊「寶峴樓」石刻。¹²²

在引文中著重描繪的重點之一，就是王濟自己與著名書法家豐坊(1547-?)¹²³的題匾與石刻。以上的這三類物件構成了明清江南園第文化中重要的物質文化部份。

第一類的裝飾物以異植與奇石為大宗。〈園第志〉所描述的異植，往往進一步地擬人化，成為具有靈性的花木。例如前面提到的法華鎮東園，內部除有水亭花樹一時稱盛之外，最特別地是有許多特別的花木，隨著主人貢生李炎逝世而枯萎：「牡丹多異種，枝安山房有綠萼梅，龍幹虬枝，枯而復榮者再，炎歿後復枯。」¹²⁴嘉慶《南翔鎮志》載有一段故事，描繪該鎮猗園的花木與主人李宜之命運相繫：

李宜之猗園中舊有海棠一株，蔭可數十圍，花時爛漫奪目。宜之每於花前召客，為詩酒之會。順治乙酉，李氏遭慘禍，園歸他姓，海棠漸枯悴，五六年不發花。宜之中州歸，詢之淚下，謂「花神有靈」，因賦絕句百首弔之。花不負主人，主人亦不負花矣。¹²⁵

¹¹⁹ 清 朱棟纂，嘉慶《干巷志》，卷3〈第宅 園林附〉，頁36。

¹²⁰ 清 閔寶梁纂，同治《晟舍鎮志》，卷2〈古蹟〉，頁2a。

¹²¹ 王濟，字伯禹，號雨舟、紫髯仙伯、白鐵道人，浙江烏鎮人。生年不詳，卒於明嘉靖十九年（1540）。曾為太學生，後官廣西橫州通判，以母老乞休歸家。家富好客，與祝允明、文徵明等名士相交，並與多人結峴山社。著作甚富，詩文有《白鐵山人詩集》、《谷應集》、《和花蕊夫人宮詞》、《君子堂日詢手鏡》等，戲曲有《連環記》等三種傳奇，合稱《碧梧館傳奇》，今存《連環記》一種。

¹²² 民國 盧學溥，民國《烏青鎮志》，卷17〈園第〉，頁4a、6a。

¹²³ 豐坊，鄞縣人，明代書家，亦名道生，字存禮，又字人翁，號南禺外史，嘉靖二年（1523）進士，出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書學淵博。所作書，善用枯筆，腕力強勁。

¹²⁴ 民國 胡人鳳續輯，民國《法華鄉志》，卷7〈園林·第宅〉，頁276。

¹²⁵ 清 張承先著、程攸熙訂，嘉慶《南翔鎮志》，卷12〈雜誌·軼事〉，頁223-224。

這段花神有靈，不負主人的故事，在明清文人的筆記中也常出現，如明人薛岡《天爵堂筆餘》載：

王父營第宅時，手植雙槐夾門甬道，甫十載，綠蔭翼然如幄。余自幼好嘉樹，十餘歲時嘗竟日坐立其下，若應門童子然。已而槐無故漸瘁，又數年業歸他氏，槐竟死。植物之靈如此，田氏之荊可信。¹²⁶

作者將第宅主人親自種植的槐樹描述成具有靈氣，隨著第宅主人家道中落，第宅轉手他人而槐樹也無故漸枯，如此有靈性的植物，就如同《太平御覽》所載古代田氏兄弟見三荊同株，而感分家之不當的故事。¹²⁷

關於園第的奇石，〈園第志〉有許多是著重這類奇石的描述，如同治《南潯鎮志》所載的小桃源，至清代稱爲「董園」，「有石挺立如人，高二丈餘，中有孔，月光照之，穿影如璧，名曰『明日峰』。後園廢，石亦爲人購去。」¹²⁸最常見的奇石就是太湖石，如菱湖鎮的長春園，園中有數丈的高太湖石，原本樹立巖巖，後折仆於地數十年，最終爲鄰人姚姓拿去砌花臺。¹²⁹奇石和花木一樣都是園第中不可少的裝飾物，但論價格與稀有度，更勝過異植，所以奇石也可以說是另一種「展示物」，作爲誇示炫耀之用。明代江南就流傳富甲一方的尙書董份構築園第時，重金購得一太湖石，舊名瑞雲峰，一說高三丈餘，一說高五丈，妍巧甲於江南。據說該石中每夜會顯現光燭，人以爲神物矣。¹³⁰

第二類「收藏物」是園第重要的文化標誌，即使在江南小市鎮中的園第，也有不少珍貴的書畫收藏物。如杭州府唐棲鎮中藏書之富，首推呂氏北野與卓氏入齋；呂氏園第即所謂「樾館」也，卓氏則又稱「水一方」。¹³¹蘇州府庠市的曹氏園，爲明代太學生曹懋忠讀書別業，「置書樓數間，積書充仞，招徠四方之士，給膳誦讀其中」。¹³²蘇州府吳江縣盛澤鎮的話雨樓，爲處士王楠所居，藏金石書畫於樓，名流時過從焉。¹³³這種現象直到清末亦是如斯，甚至有園主將其所蒐藏的文物出版書目或是碑帖，書名前即冠上該園第的名稱。如湖州府南潯鎮的石林山房，爲晚清絲商顧壽臧與其兄壽松同居之所，顧壽臧喜收藏金石書畫，所以署名「石林山房」，杭州鄒壽祺爲其編有《石林山房彝器文字目》，可見其收藏之豐富。¹³⁴楓涇鎮的適園後有望雲樓，係嘉慶中嘉善縣翰林謝恭銘（謝墉之子）收藏古今碑帖處，於此刻有《望雲樓法帖》行世。同治二年(1863)該園

¹²⁶ 明 薛岡，《天爵堂筆餘》，卷3，收入《明史研究論叢》，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第5輯，頁348。

¹²⁷ 「田氏之荊」語出《太平御覽》卷9594，頁4256。引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然聚，況我而殊哉』，遂還爲雍和。」

¹²⁸ 清 汪曰楨，同治《南潯鎮志》，志6〈古蹟一〉，頁9b-10a。

¹²⁹ 清 孫志熊纂，光緒《菱湖鎮志》，卷5〈古蹟〉，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據清光緒十九年臨安孫氏刻本影印，1992，冊24，頁3a。

¹³⁰ 王同軌《耳談》、袁宏道《錦帆集團亭紀略》

¹³¹ 清 何琪纂，乾隆《唐棲志略稿》，卷下〈園圃〉，頁5a。

¹³² 明 曹〔火章〕纂，清 曹鄴增纂，民國《庠村志》，〈園第〉，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據民國二十三年鉛印《甲戌叢編》本影印，冊11，1992，頁11b。

¹³³ 清 仲廷機、仲虎騰纂，光緒《盛湖志》，卷5〈園宅〉，頁9a-b。

¹³⁴ 民國 周慶雲，民國《南潯志》，卷1〈宅第二〉，頁23a。

樓燬於兵，正值淮軍將領劉秉璋(?-1905)統兵克復楓涇鎮，由土城中拾得望雲樓碑版，遂飭健卒載歸珍藏。¹³⁵

第三類「展示物」像是題匾與石刻，不似前幾類物件有實質的價格，或是可以用金錢購置；因為這類展示物的價值並非用金錢可以衡量，而是充份反映了園第主人的身份地位與文化品味。在江南市鎮志的〈園第志〉往往記載該園第中，擁有許多文人書畫家的題匾，最常見的是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陳繼儒與李漁等人所題的匾額。有時一個園第中先後就有數位名家之題匾，如烏青鎮的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宅，中有「玉音堂」，宅東有「塔捧樓」，以浮屠相對故名，有文徵明書扁；後改爲「拜笏樓」，爲陳繼儒所書。¹³⁶當然若有「御賜」的題匾，更是不能略而不載。如法華鎮徐家匯的後樂堂，爲明人徐光啓(1561-1633)故居，其中堂有御賜的「儒宗人表」額；傍又築東臯草堂、瀼西草堂，又有董其昌書額。¹³⁷這些題匾，也會隨著園第的易手而轉移，而富戶商人也往往爭購這類具有文化象徵的物件，以作爲自家的展示品。如南潯鎮有明天啓年間的內閣大學士朱國禎第宅「清美堂」，堂額爲董其昌所書，後爲該鎮富人朱佑明購去，懸諸其家。¹³⁸有趣的是，園第內明人的題匾有不少一直保留至清代，但清代市鎮志中往往記載的名人題匾，都是明代文人所書，極少見清代文人所書之題額，由此或可反映出清代人喜好明人題匾的情形。

此外，部份園第的壁間刻有古代著名文人之書法，和名人題匾一樣都具有展示的文化品味的效果。如法華鎮的九果園，係光緒年間邑人吳文濤所建，壁間有米元章書〈英光堂帖〉、吳雲壑書〈歸去來辭〉，皆徐氏石刻。¹³⁹震澤鎮有按察副使吳秀別墅，內有石室三：「中一室刻范蠡陸龜蒙、王蘋、陳長方、楊邦弼、陸十七、沈義甫、楊紹雲、張源像，並秀所爲〈九賢祠記〉。又有石刻「平山」二大字，係宋歐陽修書，本在揚州平山堂，吳秀罷官時摹勒於此。」¹⁴⁰

清人徐達源〈古芬山館記〉充份描繪出爲該園第主人——鹽課提舉周逸坡的文化活動、生活經營與這些物件之間的互動：

楔湖之東，有古芬山館，爲周逸坡提舉潛修之所，逸坡籍仁和，世居黎里……續纂家譜成書，所以敬宗收族，……山館其新闢也，在所居宅後屋三楹，左右周列圖籍，几案間皆古香古色，無奇巧具。庭廣二丈許，雜植花木，疊石齒齒，爲小山，有臺可登眺，有洞可繞徑。……稍折而南曰「稼墨莊」，四壁多名人書畫，蓋主人於此縱覽古今碑板墨蹟，暇輒臨池作書，所謂紙爲良田，筆爲鋤耒，墨爲稼穡者。……又南爲讀書室，藏書數千卷，主人課子講學於此，興到吟詩自樂，

¹³⁵ 清 許光墉、葉世雄、費澐修輯，光緒《重輯楓涇小志》，卷3〈志名蹟·園林〉，頁69-70。

¹³⁶ 民國 盧學溥，民國《烏青鎮志》，卷17〈園第〉，頁7a。

¹³⁷ 民國 胡人鳳續輯，民國《法華鄉志》，卷7〈園林·第宅〉，頁276。

¹³⁸ 至清初朱佑明因莊廷鑑《明史》案遭嫁禍而籍沒財產，其屋亦拆遷改建爲杭州敷文書院，而此堂額亦毀。參見清 汪曰楨，同治《南潯鎮志》，志7〈古蹟二〉，頁1a。

¹³⁹ 民國 胡人鳳續輯，民國《法華鄉志》，卷7〈園林·第宅〉，頁285-286。

¹⁴⁰ 清 紀磊、沈眉壽纂，道光《震澤鎮志》，卷5〈園第〉，頁3a。

有《遂生居稿》，尋常不以示人。余自遷居甫里，與主人別且久，近返里門，遊主人山館，顧而樂之。¹⁴¹

這些收藏物、裝飾物與展示物都和主人的文化活動與生活經營，如著書、講學、吟詩與交友息息相關。

從上述的討論讓我們明瞭到園林第宅內的物質文化，具有豐富而多元的象徵意義：裝飾物象徵著園第主人的財富與經濟實力，收藏物象徵著園第主人的文化品味，而展示物標誌著園第主人的身份地位。

結論

晚明的奢侈風氣反映了消費社會的誕生，而晚明以來競築園第之風，也是其中的一環。再加上明初制約這股風氣的制度，到晚明漸失效力，故此風已不可遏。就以江南地區而言，競築園第之風除了在大城市中蔓延以外，在江南的市鎮也可以看到這種現象，這也反映了市鎮居民的經濟實力。

雖然市鎮中的園第在數量上雖無法與蘇、杭、湖等府城內的園第相比，但也不容小覷。而其興築的高峰期正是市鎮經濟的發展在時間上是一致的。不過，明清以來江南市鎮的園第也歷經多次浩劫，從倭亂、明清之際的兵燹，到咸豐、同治年間的清軍與太平軍戰爭，都對園第造成很大的傷害。至於選擇在市鎮興建園第，除了經濟因素以外，市鎮在地理位置上具有許多優點，距離城市與市場較近，卻不如城市的喧囂，又具有絕佳的風景可供遊覽，可以說是一舉兩得。晚明以來有不少鄉居地主移居到市鎮，也有市鎮的士紳移居到城市。如果從一些建築園第的家族作觀察，他們的活動範圍在城市與市鎮之間的往來與聯繫十分密切。

市鎮志的〈園第志〉雖然呈現了上述的客觀現象，不過，我們不要忽略了這些文本有作者主觀的動機與選材標準。市鎮志中有關園第的記載，無論作者說明是為發思古之情，或為標榜娛親敬孝，或為突顯地方名人，背後的目的都是為了塑造地域文化的優越性，希望透過這些值得記憶的物件，來喚起地方意識，甚至有與城市一爭長短的味道。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市鎮志的作者，將擁有詩文雅集記錄的園第，列為市鎮志中園第志記載的重要條件。所以在市鎮志中的〈園第志〉是經過選擇後的記載，特別是只記載合乎「文人化」的園第，而非士大夫身份者所建的園第被有意地排除或忽略。

〈園第志〉書寫強調「文人化」的兩個面向，一是在園第所舉行的文藝活動，藉以建構文化名聲與社會關係；另一是園第所具備的幾種物質文化，包括裝飾、收藏與展示物，分別象徵著財富積累、文化品味與身份地位。前者是動態的活動，後者是靜態的物件，這兩種形式互相作用、交互影響，建構了「文人化」園第的形象。

透過以上對〈園第志〉的探討，讓我們重新思考市鎮志的性質，以及其所呈現的地域文化和菁英文化的關係。清末經學大師俞樾(1821-1907)在《九九銷夏錄》中，曾提及

¹⁴¹ 清 蔡丙圻纂，光緒《黎里續志》，卷3〈古蹟·園第附〉，頁16b-17a。

《南潯鎮志》的作者汪曰楨對他說的一番話：「省志備載一省之事，不可太繁。若府志，宜詳於省志。縣志，宜詳於府志。鎮志，宜更詳於縣志。務在博采廣收，不遺鉅細，以備將來修省志、府志者之取裁。」¹⁴²日本學者森正夫的研究已指出，自明中葉以後開始出現讀書人自發編寫的鄉鎮志，至清代以乾隆、嘉慶、道光、光緒四朝編纂者為最多，形成一種風氣。志書中稱住民為「里人」、「鎮人」，而稱自己的故鄉為「吾里」、「吾邑」，志書中對鎮的境域認識也很明確，可見作者們自覺鄉鎮志與郡邑志不同。此外，無論是體裁體例不同、編纂組織差異、編纂刊行負責人等，鄉鎮志的編纂者都與官志有所區分，自認可補官撰方志之不足處。¹⁴³

由本文的探討顯示，江南市鎮志所呈現的地域文化優越性，表面看似要與城市文化競爭或區分，但實際上卻更像是模仿。然而，若說市鎮的園第是暴發戶對城市園第的模仿、趕時髦，亦或是城市菁英的複製品，卻也不然。因為市鎮志的〈園第志〉充斥著地方士紳的園第，而他們其實和城市菁英們共同享有「文人化園第」的概念。亦即由士大夫的角度來看，其實並沒有城市文化與市鎮文化的二分差別。明清江南市鎮志在塑造地域文化的同時，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將士大夫菁英的文人文化再複製，或者說是一種文化再生產(cultural reproduction)¹⁴⁴，更強化了傳統士大夫的文人文化。著名史家顧頡剛(1893-1980)曾經批評傳統地方志的編纂，其云：

各處的地方志本負責實地調查的義務，可是這些編輯先生的眼光只照到皇帝和縉紳，照不到民眾。所謂的地方志者，不過集合了縉紳們的家譜——科舉、仕宦、塚墓、詩文、烈女——；加上皇帝的家產——城廓、壇廟、關津、田賦、戶口——而已。¹⁴⁵

雖然他的說法略有誇大，但也並非全無道理。市鎮志所塑造的地域文化並非是當地具有特色、與它地不同的文化，反而是與正統文化高度一致的地域文化，所以才能提供修省志、府志者之取裁。這樣的文獻並不能反映了地方人們認同感的加強，只能說是加強了地方上士紳的優越感。

文人化園第雖然在明清時期歷經幾次外在因素的破壞，但這種形式的文化本身並未因此而遭摧毀，所以仍有許多士紳不斷營建新第，或重修舊園。直到清末民初，園第為了適應新的社會與文化的需求才有了轉變，這是日後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

¹⁴² 清 俞樾著，崔高維點校，《九九銷夏錄》，卷6，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58。

¹⁴³ 森正夫，〈明清時代江南三角洲的鄉鎮志與地域社會——以清代為中心的考察〉，《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0，冊1，頁787-822。

¹⁴⁴ 「文化再生產」是指文化形式、價值觀念和思想的永久長存。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佔據統治地位的階層，會用制度化的方式，將其自身的資源優勢固定下來。即使支配階級的文化不斷再生產，並永久傳承下去，以確保他們的長久統治。

¹⁴⁵ 周振鶴編，《蘇州風俗》，〈序〉，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1928，頁1。

The Writings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Gardens and Mansions in the Market-towns of Jiangnan Region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Wu Jen-Shu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market towns in the Jiangnan region by analyzing their gardens and mansions during the Ming-Qing era. Most previous research on Jiangnan market towns has tended to focus on their social and economic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scholarship on Ming-Qing gardens and mansions has centered on renowned urban centers such as Suzhou and Hangzhou. However, Jiangnan market towns also featured a large number of gardens and mansions, but we know relatively little about them.

This paper adopts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ultural aspects of gardens and mansions. First of all, I begin by observ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arden and mansion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ustoms since the late Ming period. Here I argue that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umber of gardens and mansions reflected social and economical changes in the Jiangnan region, and that the superior conditions of market towns contributed to the expanded building of gardens and mansions. The purpose authors had in common was to use records of these sites to represent the superiority of local culture.

Secondly, through a textual analysis of records of gardens and mansions in market town gazetteers, I try to explain the authors' motives in composing these texts, as well as the standards they used for selecting suitable materials. Furthermore, gardens and mansions selected for inclusion in local gazetteers conformed to the ideal "scholar" gardens or mansions. If owners of the gardens or mansions were not officials or gentry, their gardens would be stricken from the record or simply overlooked.

Finally, I explore two perspectives that records of gardens and mansions emphasize – activities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fields and material culture – in order to show the models by which the gentry and literati intended to construct the ideal "scholar" garden or mansion. The aim of these cultural practices was not only to construct cultural status,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ctual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reby expanding the owner's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gardens or mansions had abundant and plural symbolic meanings. Decorations were symbols of the wealth and economic power of their owners, collections symbolized their cultural taste, and exhibitions marked their status. These two kinds of approaches were interactive, and worked in tandem to construct a special image of "scholar gardens and mansions".

Thus, the authors of local gazetteers, while representing the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rket towns, in fact duplicated scholar cul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form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at strengthened the traditional gentry's culture and status.

Keywords: Ming-Qing Period, Jiangnan, market-town, Garden, Mansion.